

◀ (上接 6 版)

说:“理定而物易割也。”冯友兰认为,这就是在说“了解了事物的规律,对于事物就可以制裁”,“得了规律之后就要照着规律做事,这样就可以成功”。冯友兰对《韩非子》的诠释已和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十分接近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也是时代的特色。

创造了“新心学”的贺麟也涉及到认识意义上的“道”。他说:“知道机械事实,发现科学定律,……就是一种解脱,一种自由。”便表明了这点。问题在于,如何获得这种境界?其获得方式与先秦诸子有何关系?对此,贺麟提出了三种思想方法:“第一种逻辑的方法,可以给我们条理严密的系统,使我们不致支离散漫;第二种体验的方

显然还比较简单,并没有发现先秦时代丰富的辩证法资源。问题的另一面是,在现代新儒家中很多人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变戏法”,对之鄙夷、否定;而贺麟所试图发扬的心学也主要以直觉法为主:在此背景下,贺麟对辩证法的强调显然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认识论话语形成的过程中,主流思潮之外的思想也应该得到关注。现代知识人潘光旦从其生物学学科背景出发,汲取了先秦思想中“力命之争”(孟子)的成果,既主张认识自然科学的世界,又主张成功地改变人类世界(历史),来达到儒家所说的“位育”的状态。他同时认为,获取“道”需要自觉人格为承担。对此,他一方面主张用自觉的教育来培养自主人格,其中包含着自求、自

由问题上的巨大成就。

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李大钊指出,“是非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如何判断是非、追求真理成为了时代的重要问题。李大钊认为真理不是由单个的权威所确立的,也不是小团体能够左右的。但是,他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真理论上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不可知论。他认为,事实和逻辑以及主体的良知良能是认识真理的标准,理性的论辩是获得真理的良好途径。而真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他坚信人类能够获得真理。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对庄子、孔子做出了评判。

陈独秀则上接中国古典哲学的气论传统,在此基础上高扬主体能动性,他紧密结合对先秦诸子的诠释,回答了“如何认识、把握物质化的天?如何获得认识论领域的真理?”等问题。他的回答和他的科学观、逻辑观、真理观相关。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认识论的内涵,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先秦诸子在现代的面貌。而这些思想无疑又在现实领域发挥了广泛的影响。

在学术界,站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的学者也对先秦诸子和中国现代认识论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讨论,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诠释中国先秦诸子。

郭沫若是第一位采用社会史还原法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学者。他提出了如下观点:

第一,先秦时期,“名”的自觉已经产生。它不仅事关社会制度的变迁,而且具有独立的认识论意味。

第二,《周易》表达了夭折的辩证法思想。《周易》发现了辩证法,不仅赋予了劳动人民以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武器,而且可以指导其变革世界,推翻压迫自身的社会制度。然而,《周易》虽然发现了这个秘密,但是,它在主张辩证法的同时主张“中行之道”,扼杀了辩证法的革命力量,使事物的发展永远不向反面发生变化。“相对的绝对成为绝对的绝对,所以相对的相对也成为绝对的相对。相对物间的推移转变完全停止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定矣。’”(《系辞上传》))

第三,他严厉地批评了墨子的“三表法”,否定了墨学中的所谓科学。

第四,他批评了黄老学派

的“静因之道”、墨学的宿命论,肯定了荀子“制天命”的观点,指出了获得真理也即认识论领域真理的正确途径。

和郭沫若的社会史还原法不同,张岱年采取的是“以问题为中心法”。从较广的视野来看,他的特色犹在于主张多元化的认识方法论。在《中国哲学大纲》的“致知论”中,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中,从孔子开始就有关于致知方法的研讨。孔子的方法包含了以后各个哲学家的方法之萌芽,而无所偏重。孔子以后的各哲学家所用的方法,大致说来,有六种:

一、验行。即以实际活动或实际应用为依据的方法,这是墨子的方法。

二、体道。即直接的体会宇宙根本之道,是一种直觉法,这是老子、庄子的方法。

三、析物。即对于外物加以观察辨析,这是惠子公孙龙及后期墨家的方法。

四、体物或穷理。即由对物的考察以获得对于宇宙根本原理之直觉,兼重直觉与思辨,可以说是体道与析物两法之会综。此方法可谓导源于荀子及《易传》。

五、尽心。即以发明此心为方法,也是一种直觉法。这是孟子所推崇的。

六、两一或辩证。中国哲学中论反复两一的现象与规律者颇多,而将反复两一作为一种方法而加以论述的,较少;只有庄子与《易传》论之较详。其发端在于老子。

冯契采取的则是“逻辑发展法”。他把哲学史看作是广义的认识论史,其中包含着四个问题: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以及如何培养自觉人格?如果说前面三个问题还是经典的、狭义的认识论问题,那么第四个问题则是有着中国传统哲学特色的问题。

冯契认为,先秦哲学史中,墨子有着严重的经验论的倾向,孟子则是先验论的代表。荀子既反对轻视感觉经验的冥想主义者,又反对轻视理性思维的狭隘经验论者。荀子明确提出“制名以指实”(《荀子·正名》)的观点,肯定概念是实物的反映,名实相符有一个过程;对感性和理性、知和行的关系做出了正确的回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冯契认为荀子提出的“贵有辨合”“贵有符验”是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统一,值得高度重视。他在其列入“智慧说三篇”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中认为,“‘辨合’和‘符验’的统一就是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

的全部方法论。”而荀子的这些观点也是对先秦哲学史的总结。冯契指出,先秦哲学史上,孟子是独断论的代表,庄子是相对主义的代表,荀子则克服了两者,具有了辩证法的思想。“辨合”和“符验”的统一又表现为使用“类”“故”“理”的范畴。后期墨家注重在形式逻辑的领域内使用这些范畴,荀子则把它们应用到了辩证逻辑的领域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冯契酷爱庄子。他对庄子的解读达到了古典文本与现代思想相互对话产生思想发展新的契机的境界。冯契看到了庄子一定程度上否认人们能够把握认识论领域内的自由,但庄子对逻辑思维和客观对象之间矛盾的揭示从另一个侧面表明,运用辩证法,人们可以得到此种自由。和认识论领域内的这种消极性相反,冯契认为庄子通过庖丁解牛的故事肯定了劳动的技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就能够获得审美的至高境界。在此,冯契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对庄子作出了解读,这种诠释又迫使冯契必须引进新的认识论观点,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造成了契机。

除了以上解读路向之外,我们还应该重视体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先秦诸子与认识论之间关系的思想。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便是一个范本。《发展史》认为“大道”就是人通过实践使自己的目的在客观世界实现,它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发展史》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要是唯物辩证法)为原则来解读先秦诸子,判断他们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则,还是为这个原则贡献了若干的环节,或者比较接近这些原则,只是在某些地方需要修补。《发展史》认为,老子和易传的辩证法、墨子的思想是比较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的,但也有其不足;而庄子、名家贡献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的若干环节;这个观点与流俗的看法不同。可以看出发展史的写作受到了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互对勘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成果产生,默会知识就是一个发展契机。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通过—超过: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的冯契哲学研究”[16JJD720005]阶段性成果)

用社会史还原法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



郭沫若

以问题为中心法



张岱年

如何培养自由人格是有着中国传统哲学特色的问题



冯契

法,可以使我们的学问有亲切丰富的内容,而不致干燥空疏;第三种玄思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有远大圆通的哲学识见,而不致执着一偏。”而这些方法都与先秦思想存在某种联系。他尤其着力于讨论直觉法。

应该承认,在具体讨论直觉和辩证法(贺麟称之为“玄思法”)时贺麟并未对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做较多的勾连,但是,如果联系贺麟对直觉法的讨论是应对着梁漱溟而一路发展下来,而梁漱溟明确认为儒学的基本特征就是重视直觉,那么,贺麟的无言、少言之中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他实质上对梁漱溟的说法做出了纠偏。而贺麟对辩证法的诠释,在广义上又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理解形成了某种对话,他对诡辩论的批评是和马克思主义者一致的。但是,他对辩证法的理解

明、自胜等环节,并以“独”为重要的培养步骤;另一方面,又主张采取荀子所说的解蔽的方法:这些主张乃至用语无疑复活了先秦传统。

郭沫若、张岱年、冯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诠释中国先秦诸子

马克思主义从新文化运动时期起开始了系统化、规模化的中国化进程。而在中国的大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力推进,都在以实际成绩宣告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追求认识自